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反思“中国模式”

Reflecting the Chinese Model

何迪 鲁利玲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反思“中国模式”

Reflecting the Chinese Model

何 迪 鲁利玲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反思“中国模式”/何迪, 鲁利玲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908 - 3

I. ①反… II. ①何… ②鲁…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1922 号

· 博源文库 ·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

反思“中国模式”

编 者 / 何 迪 鲁利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孔 军 李建军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班建武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8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7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908 - 3

定 价 / 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 160 年。在这 160 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 20 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思·韦伯在 100 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 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 30 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 30 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着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扬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总 序

金耀基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2009年3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

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涉

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已形成一個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放、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

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中国于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的废墟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发出改革开放的巨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力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过去有人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现今看来，应该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了。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见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的事实。的确，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日蹙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从边陲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21世纪步向强国之路上，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如前所述，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还很远，即使就中国今天最有成就的经济领域而言，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落差，市场规范的缺失，实在还未能完成一个经济的文明秩序。我们上面已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一点不夸张，它需要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当代的知识人，以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贡献各自的心力与智力，来与国人共谱中国的历史新篇章。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社会转型丛书》正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发抒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金耀基

2009年7月

目 录

前言：“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	吴敬琏 / 001
------------------------	-----------

第一部分 主题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

——近十年中国历史主义思潮之批判	许纪霖 / 013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秦 晖 / 044
也谈“中国模式”	资中筠 / 077
中国如何搭上全球化列车？	陈志武 / 086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 / 113
危机隐现	裴敏欣 / 118
“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和“亚洲模式”	乔纳森·安德森 / 128
重启“改革议程”	秦 晓 / 136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丁学良 辩论“中国模式”	/ 147
马立诚 海内外激辩“中国模式”	/ 154
王 毅 所谓“中国模式”自秦制以来就有	/ 163
雷 颐 统制经济在中国具有思想渊源	/ 166

章百家	讲“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 168
贾康	我看“中国模式”问题	/ 173
何怀宏	改革开放是摆脱“中国模式”的 历史过程	/ 177
汪涛	“中国模式”主要是经济发展模式	/ 179
马晓河	要客观地对待“中国模式”	/ 184
史正富	从政府竞争到思想竞争	/ 188
许小年	不能将竞争理论套用在政府身上	/ 191
资中筠	“中国模式”是要对抗普世价值	/ 194
何迪	从好生活到好社会	/ 197
秦晓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论”	/ 203
参考文献		/ 207
编后记		/ 220

前言：“中国模式”，还是 过渡体制

吴敬琏

以 21 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总结过去，还是对于规划未来都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经过 3 年徘徊，在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重新回到市场化的道路。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经过将近 20 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的问题。

“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

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羨，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例如，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不是富有祥和，甚至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万人的生命？

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对接。

所以，这一切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起。特别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根据早些时候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和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进行了整体推进市场化的改革。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允诺对当时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

虽然各个领域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

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 1990 年代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具体地表现为：

第一，为民间创业开拓了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 1997 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于是，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 20 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 3000 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量。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损害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生产要素能够从效率较低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全国有高达 2 亿 ~ 2.5 亿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 7 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和闲置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历来采用的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

此相对应，消费率必然会相对下降，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中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过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力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 200 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30 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不过，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虽然认为中国社会在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就以经济改革而论，中国在 20 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 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①，国有企

① 列宁在 1922 年 11 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用 commanding heights（“制高点”）来指代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1921 年初，在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艰难形势下，俄共不得已从 1921 年初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却。当时，俄共内部有一部分人表示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认为这会危及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列宁对这种质疑作出了回答。他指出，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掌握了一切 commanding heights，掌握了土地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国家还可以随时对政策作出改变。因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共是毫无危险性的。commanding heights 一词在列宁著作的中文版本中译为“经济命脉”。